



自由 主義

Liberalism

文學理想的
終結 ○

(1945.08~1949.10)

胡傳吉
—
著

自由

Liberalism

主義

文學理想的
終結○

(1945.08~1949.10)

胡傳吉
—
著

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 (1945.08-1949.10)

作者 / 胡傳吉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邱澍誼、姚宜婷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2年9月BOD一版
定價：5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還原歷史

胡傳吉博士這部大作論題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學術關懷的勇氣，它需要來自內心的堅持才有興趣關注這曾經塵封的一頁；二是具有良好的理論修養和直覺的洞察力才可能闡釋「終結」的意味。因為這個論題的文獻資料幾乎人所共知，材料背後的發掘就更加重要。所幸的是胡傳吉博士在這兩方面都不負所望，而且表現優異。她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1945.08—1949.10）》，新銳、卓識和感人心魄的歷史敘事完美結合在一起，她寫成了一部今後討論這時期文學史無法繞過去的重要論著。

自由對人有多重要，甚至推廣一點，對具有高級中樞神經系統的生物有多重要，嘗試去用繩捆住一隻貓就可以知道。還記得起裴多菲激情澎湃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如因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可是這個看似不言自明的真理，在高度「群化」（socialized）的人類社會成為一個千言萬語都講不盡的問題，它甚至帶來性命威脅的危險。在歐美，自由是嚴肅的思想史探討的一部分，也是現代社會進程所經歷的自由與奴役的持續鬥爭取得的最重要文明成果之一。在中國，它一樣綿遠流長，不過它用另一個難以捉摸的詞——逍遙——來寄寓。逍遙如鳥，無束無縛，好不自由。可是林泉高致的境界畢竟與法治所規定的人間秩序有距離，前者難以落實為後者。晚清的變革和辛亥革命開啟了「自由中國」的可能性，不過它的動力不是來自古代而是來自西方。胡傳吉博士所討論的從抗戰勝利到「人民共和國」底定的歷史就是晚清以來自

由在中國伸延、挫折和時常反復的曲折歷史的一部分。雖然她探討的遠不是「足本」的歷史，只是文學思潮和文學，但它足以折射這歷史進程在人心所造成的長久震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魚肉中國數十年的倭日終於由它的天皇播出《終戰詔書》，消息傳到中國，無論重慶還是延安，人們湧上街頭，徹夜狂歡。歡笑、悲痛、眼淚與和平的希望，一起從那個晚上噴湧而出，迴蕩在無處不是戰爭廢墟的中國。美國人從一九四四年底就介入了調停重慶和延安的衝突。那年十一月九日的晚上，毛與羅斯福總統的特使赫爾利在延安的窯洞內舉杯，調停協定簽署，與日後蔣、毛重慶談判一樣，和平的希望隨著調停和日本戰敗，一點一點生長出來，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心裏。經歷過長久的內亂、軍閥混戰和八年「全民抗戰」，中國又一次處在新生的邊緣，這哪能讓人不小心生盼望？這就是胡傳吉新著所探討的「自由主義文學」的大背景。有意思的是，心生這盼望的人是無力將這盼望付諸實施的人。自由，說來複雜，但文學的自由則甚為簡單。只要作家保持對政治的消極不參與，和政治對文學的積極不干涉，則這事兒就有了眉目。秉持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人，認同前者並身體力行；希望後者卻束手無策。因為若要政治不積極干涉文學，這就不由文學說了算，而需要在人權基礎上「法治」（rule of law）的保證。其時的國家，政令尚未統一，法治從何談起呢？在明眼人看來，這自由主義文學一定是短命的。但正因為它短命，所以它悲壯。在一個短暫的歷史瞬間，讓我們看到人心不死，曙光猶存。那個時代持有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作家，他們並不是一個文學團體，而只是幾個作家圈子，圈子之間甚至沒有來往。在國、共和戰不定而無暇顧及的間隙，獲得了有限未受干預的空間。當歷史的天平決定性地倒向「光明力量」一邊的時候，同時也意味著政治積極干預的來臨，亦即是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終結。

胡傳吉博士在這部新著中，深入到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內部，她發現它的困境：熱愛自由卻無力爭取。這個「悖論」用今天話講，就是只能說「不」，不能說「是」。來自政治的激情，無論左還是右，都為

他們拒絕。以拒絕、沉默、不參與為姿態的自由，也就是「消極自由」。它固然可貴，固然為推動和成就傑出文學的重要條件，但畢竟嬌嫩，經不起人間的風雨。自由可不可以爭取呢？當然可以，但如果豁出去，為獲取自由而搏擊，這又有違文學的本性。這是橫在那個時期熱愛自由又熱愛文學的知識份子前面的一道難題。陷入了這困境，他們只能成為「時代大潮」中隨波起伏的弱勢一群，他們的命運是被註定的。胡傳吉博士關於自由主義文學理念困境的解釋非常有洞見，體現了她對歷史「同情的瞭解」，同時也讓讀者意識到，自由是有代價的，哪怕只是「消極自由」，有時也會讓你痛得刻骨銘心。

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呼聲，是在國、共「逐鹿中原」的大背景下產生，這個顯而易見的巨大因素很容易遮蔽發出這呼聲的知識份子精神世界的內部問題。我特別欣賞胡傳吉拈出「自由主義良心體系塌縮」這一命題。這一命題從內部解釋了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終結」，它極具說服力，而又為「終結」之後的種種「檢討」、「改造」的事實所印證。人性是複雜的，作為知識份子在那樣動盪的年代，他們也有自己理智和感情的衝突。文學理念的認同是一回事，而感情的折磨、內心的撕裂和生活的煎熬又是另一回事。正如胡傳吉在書中說的那樣：「誰能停止戰爭，或者誰能承諾結束戰爭，誰就能夠得到人心。人道情感的弱點就在於，它對不幸的敏感甚於對幸福的敏感，儘管人道情緒能夠在幸福面前自然而流露，而在不幸面前要考慮自己的反應是否合宜，一旦，有力量向他們展示未來的幸福、美好的規劃，出於對現在苦難的深深同情，他們內心的城堡也可能在幸福的感召下走向軟弱與順從。」自由主義文學及其理念「終結」的事實誰都看到了，但「終結」的機制是什麼？它又是怎樣起作用的？這些問題在談論這段歷史時是被忽視的，胡傳吉道他人所不曾道，為讀者勾勒了一幅自由主義城堡從內部崩陷的具體圖景。秉持自由主義文學理念的知識份子心地是善良的，人格也是高尚的，對於此點我毫不懷疑。然而，人性的詭譎就在於無論秉持何種理念，它的根本驅動力無一例外是追求「美好生活」。而在當年江山易色的「歷史瞬間」，「美好生活」彷彿從天而降，

倏忽之間唾手可得。為了這一切，放棄那些小小的理念，甚至放棄文學，又有什麼捨不得呢？文學不可能比「美好生活」更重要。假設回到當初的「歷史瞬間」，就算是我自己也一定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定力看穿那數十年之後才被證明是海市蜃樓的「美好生活」。指出自由主義文學良心體系的自我承擔的不可能並不是責備，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還原」，正是在真切的「歷史還原」中，胡傳吉透過她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可信的歷史。

胡傳吉博士這部大作，當初是她的博士論文。答辯過後，她花了三年時間琢磨、增刪、修訂、潤色。不但文獻材料更加充實詳盡，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完備。前數日，她來告訴我，書有望出版，並讓我寫序。我曾是她的老師，十分高興，欣然命筆，寫下上面的讀後感想。

林崗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四

目次

序 還原歷史／林崗	i
-----------	---

緒論 關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間自由主義文學的敘事史	1
---------------------------------	---

chapter 1 自由作為一種觀念背景	17
----------------------	----

一、無限的自由與有限的自由	18
---------------	----

二、自由的最低限度	31
-----------	----

chapter 2 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困境	41
-----------------------	----

一、文學形勢的變動	42
-----------	----

二、文學策略的變與不變	45
-------------	----

三、組織與權力的合流	53
------------	----

四、文學理想自身的困局	72
-------------	----

chapter 3 消極自由與文學選擇	79
---------------------	----

一、自由主義文學與自由主義報刊	80
-----------------	----

一、消極保守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	1
三、消極自由與個人選擇	1
chapter 4 自由主義文學的藝術趣味	1
一、文學之獨立趣味的區分	1
二、敘事性文體的寫作趣味	1
三、非敘事類文體的寫作趣味	1
chapter 5 自由主義文學的藝術良心	2
一、內心的法官	2
二、苦難的意象與複雜的罪惡感	2
三、連帶的責任關係	2
四、自我的去向	3
chapter 6 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	3
一、文學自由與文學責任的關係	3
二、自由主義文學前提的消失	3
三、消極自由的崩潰	3

[illegible]

緒論 關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間 自由主義文學的敘事史

一、問題的發生

本文所指「問題的發生」，即，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間自由主義文學這一事實，是如何發生，並如何得到確認的。澄清「問題的發生」，就要涉及到兩方面的史實。

其一，自由主義文學如何發生。這一階段，自由主義文學作家、理論家，以及自由主義文學所依託的主要言論出口，有一些什麼具體的主張、思想、作品，他們的寫作姿態、人生選擇又如何，這些，是自由主義文學的最基本事實，也是確認自由主義文學是否存在的最有力的依託。

釐清此間自由主義文學的基本事實，是本文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之一。

¹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這一時間段，下文多以「此間」或「此時」指代。

其二，如何確認、如何得以確認自由主義文學這一事實。除了以基本事實進行自我確認之外，事物的對立面、異面也往往提供一些線索與證詞以確認這一事物的存在。不同於由主義文學的文學力量，諸如左翼文學等，以反對或排斥的嚴厲姿態，確認了這種不合時宜的文學形態。之所以反對，是因為他或她承認且試圖消除你的存在，於是，事物由其反面或異面證明了事物的存在。

這一階段，有一些重要文章顯示出共產黨文學理論家們對自由主義文學作家、理論家的態度。諸如，默涵的〈「清高」和「寂寞」〉（《華商報》，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邵荃麟的〈二丑與小丑之間：看沈從文的「新希望」〉（《華商報》，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胡繩的〈為誰「填土」？為誰「工作」？〉（《華商報》，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新方向」，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新方向」，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由（邵）荃麟執筆、代本刊同人而寫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新方向」，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邵）荃麟的〈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大眾文藝叢刊》第二輯「人民與文藝」，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這些文章，對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對《大公報》等自由主義報刊，分別作了基於階級立場出發的區分與定性。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一文，提醒並批評了民主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者的游離姿態，該文對聞一多及朱自清的褒揚與定性，可看出毛澤東對自由主義文學的基本態度。³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後期所出現的這批針對自由主義文學而發的批判文章，可看成是確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存在並日趨消失的重要證詞。

2

² 共產黨文藝理論家對這一階段自由主義文學的具體態度，本文第六章〈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有詳細論述。

³ 見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由上述兩個方面的綜合，可以確認，本文所研究的對象，此間的自由主義文學，從學理視角來看，是可靠的。

在文學事實可以確認的前提下，接下來，就是文學史如何對待這一文學事實的問題，即，文學史如何發揮其權力的問題。

二、文學史的權柄

一九四九年以後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以前，大陸文學史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的處理手法，大致有三種。此三種手法基本上都限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內。

第一種，此間的自由主義文學不被文學史提及。不提及，即有意或無意忽略、不接納、否定，這種傾向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後、八〇年代以前尤其突出。不被提及的原因，或因為編著者的個人立場、個人信仰，或因為功利文學評審制度的排斥與厭惡，具體原因，實難以細究區分，因為，在五〇年代以來的文學體制裏，很難說清楚，哪些因素是個人的，哪些因素是體制的，相對可靠的說法是，個人與體制混為一體，立場趨同。

如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一九七九年版），即可看成這一做法的實例。《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卷）的編纂邏輯基本上按戰爭進展順序而定。該書將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文學編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第五編），該編的第三章，作者定為「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在這一章裏，劉綬松描述了以《大眾文藝叢刊》為代表的許多革命作家，同美蔣作鬥爭的事蹟，對郭

沫若等人在《大眾文藝叢刊》上所表的文章有所評述，但對「自由主義文學」隻字不提，編著者的結論是，「三年來，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是完全勝利了的」。⁴

王瑤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與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相比，在處理四〇年代後期的自由主義文學時，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新文學史稿》第四編《沿著〈講話〉指引的方向（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之第十六章〈新的人民文藝的成長〉，設有〈思想鬥爭〉一節，論述方式、引用文獻、評述標準，與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初稿》的「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傾向基本一致。⁵

第二種，因左的對立面而被提及，以反對、否定的姿態去評述此間的自由主義文學，並將其納入思想鬥爭的範疇內描述，行文重點一般放在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身上，意在說明朱光潛等人的路線不對（反動、落後、無恥等），對這一時段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情況及其獨立性則基本上是忽略不計。這一處理方式，通常只是把眼光放到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的身上，對張愛玲、錢鍾書、廢名等人基本上是隻字不提。這一處理，出於證明鬥爭正當性、勝利必然性的初衷，但反而使自由主義文學不至於被完全忘記，他們被一種類似於「仇恨」的情感、被一種比熱愛更長久的情感所惦記。最終的可能是，此間的自由主義文學，將被比仇恨寬大的人性情感重新發現。

由林志浩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第十九章〈國統區的文藝運動與宣傳及捍衛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鬥爭〉裏，專設一節討論自由主義文學，但編著者在目錄中所採用的說法是「關於民主個人主義及其在文

⁴ 引文及相關論述見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下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六六九—六七七。《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初版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間，著者曾修改，具體情況參見，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修訂再版書後〉（一九七九年二月），見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下卷），頁七二七。

⁵ 見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修訂重版，頁五八四—五九二。
⁶ 即便是對自由主義文學的批判，所占篇幅一般也不會超過一節的內容。

藝界引起的鬥爭」，這一說法，承接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文的說法，而在正文中，編著者解釋說，「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即舊民主主義分子，或自由主義分子」，編著者進而由階級立場出發，將民主個人主義者定性為資產階級，重點放在這些人的政治不正確上，並陳述了革命報刊和革命作家如何與反動文藝作殊死鬥爭並取得最終勝利，該節的最後，有這樣的陳述，「先進的人們正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把鬥爭進行到底，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政治陰謀，並做了很多耐心的工作，把絕大多數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爭取過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使他們逐漸站到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來，逐漸樹立為新中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並在實際工作中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林志浩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與中南七院校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九七九），在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分子）問題上，傾向與編寫方式基本一致，林志浩主編的版本略詳一些。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談到「對沈從文等人的文藝思想的批評」，對論戰的基本事實進行了描述，雖無明顯的評論，但該書注重對左翼文學的梳理，對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事實、思想事實沒有涉及，孰輕孰重，誰正誰反，一目了然。類似的處理，還有由十四院校編寫組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對「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分子）的結論方面，在文藝力量「勝利大會師」的思路方面，各院校編寫組有著驚人的一致。

唐弢、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則明確認定四〇年代中後期的思想鬥爭裏，有「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第十九章第三節），編著者認為，這次批判不夠徹底，「這次批判對

⁷ 參見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六六一—六六七。

⁸ 見中南七院校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六六九—六七二。

⁹ 見十四院校編寫組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六一三—六一八。

政治思想問題注意較多，對錯誤文藝理論本身批評不夠」，但編著者在該節也並沒有對錯誤文藝理論本身作出細緻的論述，唐弢、嚴家炎談自由主義文藝對內對外錯誤的重點所在，仍然是政治之爭。¹⁰

第三種，文學史的編著者不作評述，而做資料性的描述；或者在文學資料、文學作品的彙編中，收入共產黨文藝理論家針對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文學的批判文章，共產黨文藝作品，同時相應地收入自由主義文學作家、理論家的文章及作品，以作專題集結。

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或文藝思想的批判，有編者曾將其彙集，且未加評論。

由北京大學等單位主編的《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五冊），收入毛澤東等人的十三篇文章，納入「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欄目下。¹¹

陳壽立編《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史料摘編》，沈從文、默涵、蕭乾、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被集結在「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的目錄下。¹²

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文學理論卷二》設有「關於文藝自由」子目，收有朱光潛、郭沫若等人的論爭文章，共計八篇。¹³

徐迺翔主編的《中國新文藝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理論史料集》設有「關於『自由主義方式』」子目，收入《大公報》兩篇社評（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及胡繩、朱光潛的文章，共計四篇。¹⁴

¹⁰ 引文及該問題的具體闡述見唐弢、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四一三—四二二。

¹¹ 北京大學等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五冊），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五六三—五六六。

¹² 陳壽立編：《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史料摘編》（下冊），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三〇六—三一六。

¹³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文學理論卷二》，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七三—七九六。

¹⁴ 徐迺翔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理論史料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頁七二九—七

儘管彙編未加評論，但可以看出，這種資料彙編，其思路仍然是將自由文藝放入文學運動、文學論爭之對立的框架內去彙編的，這種彙編，所局限的，仍然是幾個人、一張報紙、兩個對立的派別，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文學自身的獨立性及存在價值，依然是無從談起。¹⁵

三、星散而發的研究

近年來，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的研究，呈星散而發狀。學人開始在尊重基本文學事實的基礎上，謹慎評述這一時期的自由主義文學。又有學人，或不明確提自由主義文學，而是將部分獨立作家的作品及行為納入四〇年代、五〇年代的文學環境下去考察。這些研究或評述，儘管反映了學界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或文藝評價的一些新動向、重要轉變——由五〇年代、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的二元思維觀轉向多元思維，但總體而言，各種研究仍嫌零散。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的研究，特別是將此間自由主義文學作為獨立的文學形態來研究，有待深入。

錢理群、洪子誠、賀桂梅、吳中傑、劉川鄂等人，為研究此間自由主義文學提供了不少思路。

錢理群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對話與漫遊：四十年代小說研讀》等著作中，並沒有特意提到此間的自由主義文學，但著者對廢名、沈從文、穆旦等作家詩人之作品的探討，也對此間自由主義文學

四一。

¹⁵ 而就《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藝大系》的其它卷來看，諸如詩歌卷、散文雜文卷、小說卷等，自由主義文學作品也有作品進入其編纂體系。